

← (上接10版)

利亚莫纳什大学仿照康奈尔建立起了东南亚研究中心；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改革中，东南亚项目的毕业生露丝·麦克维(Ruth McVey)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康奈尔模式不仅是东南亚研究的中心和策源地，也成为地区研究的经典组织范例。卡欣无愧为东南亚研究的世界性领袖。

高贵的爱国者

在卡欣去世后的追思会上，卡欣最得意的学生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深情回忆了老师。他称卡欣是一个“爱国者”。卡欣的爱国并非盲目支持美国的官方政策和行为。他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精神价值有着独立的思考和判断。他对于美国有着极高的期望，他的批评也常常夹带着“恨铁不成钢”的愤怒和失望。

卡欣成长于罗斯福新政高歌勇进的年代，他本人即是新政的支持者和坚定的“自由派”。他热心政治，怀有强烈的社会政治理想。早在哈佛的学生时代，卡欣就非常关心政治和国际关系。1940年，正值法国陷落前夕，美国虽未直接参战，但是欧洲和亚洲的局势已经引发了卡欣和他的同学的关注。他们组织了一场名为“通过新国际秩序达成和平”(Peace Through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)的讨论会，以模拟国际会议的形式，邀请各个高校的学生扮演不同的国家，借以表明战争的矛盾可以通过协商解决。他们还曾设想邀请德国、日本驻美大使出席，但是在校长科南特(James Bryant Conant)的严厉批评下作罢。虽然在现在看来，卡欣的想法有些天真，但是这在当时也算是不小的创举。面对大战的危机感与压迫感，作为学生的卡欣没有选择沉默，而是勇敢地表达对于时局的关心和态度，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。

在冷战的背景下，随着国家权力向学术界的渗透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。知识分子逐渐从象牙塔中走出，卷入政治和舆论的漩涡。“1950年代以来，学院学者介入外交和国防事务蔚然成风”(牛可：作为冷战批判者的加尔布雷斯，《世界知识》2009年第15期，64页)，很多学者乐于充当“冷战斗士”，全力支持政府的反共和尚武政策。其中不乏有罗斯托、白鲁恂这样的知名

学者。然而也有少数人坚持着“漫漫长夜守更人”的非依附性身份，他们选择与政府保持疏离，对美国的冷战政策提出严厉的批评。卡欣即是其中的代表，“他似乎是战后美国对东南亚霸权计划的逻辑历史对立面”(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，《比较的幽灵，民族主义、东南亚与世界》，甘会斌译，译林出版社，2012年，23页)。

在印尼调查期间，卡欣就因敢于批评美国的印尼政策而被吊销护照，甚至遭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。1950年，在荷兰海牙召开了旨在解决印尼问题的圆桌会议。卡欣对于美国代表柯契兰(Merle Cochran)的表现十分不满。他认为柯契兰虽然促成了印尼最终的独立，但是却又偏袒荷兰。在柯契兰的支持下，荷兰拒绝归还西伊里安(West Irian)。西伊里安领土成为遗留问题，不时引发冲突，直到1963年才最终解决。柯契兰还向印尼共和国施压，强迫印尼偿还荷属东印度欠下的13亿美元的债务。而这些债务大部分是1945年后荷属东印度“镇压”印尼革命的军费开支。回到美国后，卡欣四处奔走，为新生的印尼政权寻求支持，他也将对柯契兰的意见和批评传达给了国会议员。柯契兰怀恨在心，说卡欣是“亲共分子”，将卡欣的护照没收了将近五年时间。

到了1960年代，卡欣又参与了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。1965年5月，他被美国全国教育委员会邀请到华盛顿参加辩论，对手是当时大名鼎鼎的、约翰逊政府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·邦迪(McGeorge Bundy)。约翰逊有意贬低这场辩论的影响，在辩论开始前的最后一刻，将邦迪派往多米尼加执行任务，由来自伯克利的罗伯特·斯卡拉皮诺(Robert Scalapino)取而代之。出乎约翰逊的意料，这场辩论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虽然卡欣自觉表现平平，没有发表什么“惊

世”言论，但他的观点却被很多人接受，经常被反战宣传物所引用。卡欣此后频繁受邀到各所大学发表演讲。

即使被推到风口浪尖，卡欣也力求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清醒的判断力。直到1960年代，康奈尔乃至整个美国的越南研究还非常薄弱，卡欣还并非印度支那地区的专家。随着美国军事介入越战的逐渐升级，美国国内的反战声浪不断壮大，被认为是“东南亚研究专家”的卡欣成为了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。卡欣有自己的苦衷：当时很多人对地区研究存在误解，理所当然地将卡欣认作“东南亚通”。然而东南亚是一个很笼统的、甚至存在争议的概念，卡欣所研究的印尼与越南差异巨大。卡欣对此颇有自知之明，所以在1965年之前，他虽然对美国越南政策不满，但基本还限于密切观察，对越战的批评也只在康奈尔的课堂上发表。然而情势的发展却让卡欣难以继续保持沉默。当时美国少有的几个越南专家，都迫于政府的压力而噤若寒蝉。虽然因此招致了很多批评、非议，卡欣依旧选择挺身而出。

卡欣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，他对于美国的冷战政策没有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批判。在反冷战和民权运动中，很多知识分子都试图向当权者讲述“真理”。他们往往都有着鲜明的立场和观点，并对此笃信不疑；很多人坚持践行着自己的价值和信念，敢于直言，挑战当权者。但是冷战中，和理念、价值纠葛不清的“真理”却是含混或者苍白的。任何人、任何群体、任何势力都可能依据自身的利益和动机，而开发出一套属于自己、服务于自己的“真理”，并对此持有不容置喙的武断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冷战本身就是价值观念冲突的结果，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为此战死海外，不计其数的亚非拉民众蒙受灾难。但是美国“新左派”史学的领军人

物、著名外交史学家沃尔特·拉弗伯尔(Walter LaFeber)指出：卡欣的独特之处就在于，他致力于“向权力讲述”的是关于事实的“知识”(George McT. Kahin: *Southeast Asia: A Testament*, Taylor&Francis e-library, 2005, Forward ix)。卡欣不以价值判断出发，而是利用实地调查和阅读档案，通过学者式的观察和分析，极力搜寻着被掩盖的真相，并将其公布于众。卡欣所寻求的是把判断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，他要求当权者的也是这一点。他也因此受到各方尊重，即便他的论敌和宿敌。

因为越战，卡欣将研究重心转向了印度支那。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档案，而且从1961年起一直坚持到越南实地调查。长期的田野工作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，他曾2次突发心脏病。卡欣与南越的高层吴庭艳、阮文绍，北越总理范文同等人都有着密切的交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借助偶然的机，卡欣与佛教组织，特别是反对南越政府的佛教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。佛教是越南最大的宗教，南越80%的人口都是佛教徒；佛教组织在1963年开始参与反对吴庭艳政府的抗议活动，逐渐成为南越重要的政治力量(同上，pp189)。卡欣认为当地的佛教组织作为“第三方”力量，本有助于促进南北双方的沟通，尽快结束战争。但是无论是西贡还是美国政府都对佛教组织缺乏了解。此外，1967年卡欣还在佛教组织的帮助下，暗访了顺化等地的医院。美军曾在此地投放大量汽油弹，造成大量平民伤亡。南越政府却借助“转移伤员”等各种手段蒙蔽调查团，极力掩盖惨剧。卡欣将调查结果如实反映到了美国国会，引发关注。

在卡欣看来，南北矛盾本可以通过全国大选而和平解决，但是美国的介入打破了《日内瓦协定》规划的和平进程，艾森豪威尔的印支政策破坏了一

切。他认定胡志明对美国的反抗，不是来自于世界共产主义，而是植根于越南民族主义。他认为无论是在北越还是南越，民族主义都比共产主义发挥着更为强大的力量(同上 Forward xi)。北越政权的兴起，本质上并非共产主义的“扩张”，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了无稽之谈。由此，美国声称的发动越战的理由，就失去了道理和合法性。他认为美国政府过于轻视民族主义的力量。驱逐法国殖民势力、追求国家独立的领袖是胡志明，而非南越西贡政府。越南民众对于民族主义的信仰与热情，使得胡志明比西贡政府更具合法性。所以他认为无论美国给予多么强大的军事援助，也无法长期维持南越政权的存续。

虽然刻意与政坛保持距离，但卡欣也会竭尽所能去推动美国改变政策。他在富布赖特(James William Fulbright)与麦戈文(George McGovern)的身上看到了相似的理念和热情。富布赖特和麦戈文是当时国会中反战的“先锋式”人物，卡欣帮助他们分析印度支那地区的历史和政治发展状况，为他们的反战行动提供事实依据。他曾与麦戈文合作，在电视辩论中舌战威廉·邦迪(William Bundy)和“鹰派”盖尔·麦基(Gale McGee)。邦迪将卡欣视为强劲对手，用尽各种手段拉拢。在富布赖特的邀请下，卡欣向20多位参议员讲述了在越南调查的见闻，影响甚至改变了某些议员对于越战的看法。从他们的身上，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学者与政治家合作与互动的一种样式，其中多有发人深省之处。笔者在这里想到的是：卡欣虽然不是职业政治家，但是我们能够在他身上看到马克斯·韦伯对于理想政治家的定义：热情、责任感和判断力。在知识生产职业化的年代里，卡欣在他自己作为职业学者的位置上、以他自己的方式寻求和运用知识，坚守理念，阐发价值。

2000年，卡欣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去世。作为学者，卡欣著作等身，《印尼的民族主义与革命》依旧是印尼研究的经典之作；作为教师，他领导了康奈尔东南亚研究项目，培养了安德森等一众杰出学者。他的一生贯通学术和政治，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与教益。

本文写作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周陶泳教授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教授帮助良多。特此志谢。

(作者单位：北京大学历史系)



卡欣的学生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与卡欣的妻子，1983年